

学林

# 袁同礼书信中的国际交流网络

■ 韩琦

作为图书馆的负责人，袁同礼特别关注充实馆藏，为此与国际学人多方交流，而伯希和正是与他互动颇多的人士之一。抗战期间，先生和伯希和的通信较少，存留的信中可见先生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呼吁法国对中国图书馆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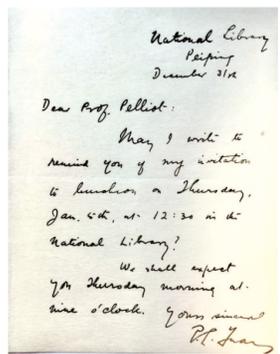


袁同礼 (1895—1965)



袁同礼为伯希和设宴之请柬，时间分别为1935年3月27日（请柬误为4月）与5月9日

袁同礼致伯希和明信片与信件 均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1935年到访中国，停留了数月时间，在北平期间，不仅多方演讲，并且频频参加筵宴。袁先生多次请伯希和餐叙，安排讲座，并安排他在故宫博物院调阅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的画作。而先生为图书馆公务也多次出访，我们在信件中可见到先生工作的繁忙。特别是先生在1934年、1945年两次访问欧洲，考察图书馆事业，其中1934年这次停留时间最久，6月至11月间访问了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图书馆，并赴西班牙参加学术会议，多次在巴黎与伯希和见面。先生到过的城市包括布鲁塞尔、巴黎、柏林、维也纳、伦敦、马德里、佛罗伦萨、罗马，在罗马期间，很可能与罗马大学汉学教授瓦嘉（Giovanni Vacca, 1872—1953）晤面。抗战期间由于局势的原因，先生和伯希和的通信减少，存留的信中可见先生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呼吁法国对中国图书馆的支持。这些通信为我们了解先生的学术活动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

袁先生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先后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对图书馆的职责有深入的了解。除了创建国立北平图书馆，他还是出色的目录学家，继法国汉学家高迪爱

学术界的交往格外留意，无意中发现了有关袁先生的新史料。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现先生和斯文·赫定往来书信，后又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发现先生致伯希和信件，都是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从中可以得窥先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仅以先生和伯希和的交往为例，在1931—1945年近十五年间，现存的给伯希和的信就有十八封之多，尤其展现了先生的学术交流网络。

这批信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有关学术资料的交换。作为图书馆的负责人，袁先生特别关注充实图书馆的馆藏，千方百计为国内学者获取所需资料，为此与国际学人多方交流，而伯希和正是与他互动颇多的人士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和伯希和都十分关注《元朝秘史》的研究，而巴黎也保留此书的一个版本，于是先生写信请伯希和代为复制。另外，国内学者对明清之际传教士多有兴趣，如从事历史研究的李俨先生，曾多方收集耶稣会士相关资料，而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这方面资料最多，因此多次写信请求袁先生代为复制。先生信中请伯希和复制有关文儒略和南怀仁的传记，很可能是受李俨先生之托。同样，先生也为伯希和提供了很多帮助，伯希和当时感兴趣的著作，包括《高丽图经》《古玉图谱》《格古要论》《石渠宝笈（二编）》等书，先生都代为协助查找。同时，先生为中法图书交换，特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汉学图书馆的馆际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信件中也多有学术访问交流活动的记录。伯希和在1932—1933年、

(Henri Cordier, 1849—1925)之后，增补了西方汉学文献书目，所编中国留洋欧美博士论文目录，对近代留学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还编纂有铜器、艺术品等多种目录，迄今仍为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为编纂这些目录，先生忘我工作。以《西文学书目》为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编纂此书，先生走访了欧美的许多重要图书馆，收集了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的18000种著作，阅读和查对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献，为核对作者年龄和汉名信息，多方写信求证，很多人的汉名始为人知。因此，此书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学术信息，也是研究辉煌时期的欧洲汉学和美国早期汉学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留洋欧美的中国博士论文目录也同样凝聚了先生的多年心血，如早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丁肇青，其博士论文研究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之前我一直不能确定他的名字，近来的论著提到他时常出现音译错误，而事实上先生当年即已考出真名。要不是有先生的努力，许多先辈学者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后世遗忘。

先生以强烈的爱国情怀，从事流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献和文物的研究工作，无论对《永乐大典》所存各卷的调查，还是对铜器、艺术品目录的整理，都贯彻了这一理想。而对抗战时期公立、私立院校图书馆损失的统计，则是为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体现了拳拳的爱国之心。除此之外，先生还负责《图书季刊》英文本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推进了学术事业的交流和发展。先生一直期盼回国，然而由于一些因素，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思忆录》一书收录了很多先生海内外友人的纪念文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先生为国奉献的“劳碌的一生”和提携后进、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以及对图书馆事业和学术文化的重要贡献。2010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开会纪念袁先生，会后出版了《袁同礼文集》和《袁同礼纪念文集》。近日，国家图书馆雷强编定《袁同礼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即出），洋洋三百万言，收录信件原文多为首次刊出，这对了解袁先生的为人、治学以及学术交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化学系教授）

## 「此子宜置丘壑中」

■ 蔡谷涛

《世说新语》喜好比较人物。如《品藻第九》：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此时，庾亮贵为晋明帝皇帝的兄长，刚接替王导成为中书监，是后来明帝的顾命大臣，权势自不可挡。而谢鲲，代表彼时的陈郡谢氏，刚刚渡江南来，在王敦幕府任职，距离成为一流的贵族，还需数代人才的积累。于是，或是谦虚、或是回避，谢鲲答道：如果相比在朝廷之上的作用，我大概是比不上庾亮；但是，放情山水方面，我倒是胜过他。《品藻第九》中明帝以周顗比谢鲲，周顗和谢鲲，周顗比庾亮等，大概回答都是世俗之外，别有所得，但唯独谢鲲这句话，被后人记下。《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顾恺之为谢鲲画像时，便有意嘲嘲他这句“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于是把他画在了石头里。不想千年之后，1964年在南京市中华门外戚家山的五座坟墓里，出土一块石质的墓志，上书“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鲲幼舆……”。

谢鲲墓志的出土引发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的关注，郭沫若认为：谢鲲及同时代无论中央还是被辟居远方的墓志，以及《平复帖》和南北朝写经的字体，都有隶书笔意，而王羲之之作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并无这种特征。郭沫若又结合《兰亭序》的内容，断言此文非王羲之的原作，《兰亭序帖》更非王羲之的笔迹。此论一出，不仅对千古流传的东晋书法艺术的颠覆，更是对书法史和文学史的重大改写。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有名的“兰亭论辩”由此展开。

如果说谢鲲因他的墓志“端委庙堂”，东晋另一位名士温峤，则因他的墓志出土而洗清一大谣言。温峤是东晋中期政坛重要人物，史籍中记他博学属文，风仪秀整，英爽显名，更有和其舅阮刘琨在北抗胡，成为刘琨的使者南下劝进的经历。南下时，刘琨对温峤说：“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君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子其行乎？”将他比作西汉名臣班超、马援，可见刘琨对温峤的重视。到达建康之后，“王导、周顗、庾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此后在平定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中，温峤功不可没。但就是这样“忠诚著于圣世，助义感于天神”（陶侃所撰表奏文）的温峤，《世说新语》里却记了他一笔，见《假谲二十七》：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

离散，唯一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公密有自婚意，答云：“婿婿难得，但如婿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姑不减婿。”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世说》说温峤在丧妇之后，通过设局向自己的从姑娶来自己的表妹为妻。然而刘孝标注据《温氏谱》所载温峤婚姻情况，认为此条虚谬。因此温峤到底有没有骗娶一节，成为自《世说》成书以来很大的一个争议。而在2001年南京北郊郭家山的温峤墓志出土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峤历任妻子的名字：高平李氏、琅琊王氏、庐江何氏，并没有出现“刘氏”的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世说新语》里记载的这个故事纯属民间传闻，墓志的出土证明刘孝标是正确的。

六朝人感慨人生无常，“死生亦大矣！”墓志恰如其跨越死生的“通行证”。墓志里的故事还有更多，从形制的演变到葬俗的发展，从生平的补充到家族的重视，更何况是在东晋南朝那个被后人神往的时代——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温氏这些贵族及其子弟们曾经鲜活地生存在当时的京都建康，现在的南京城中。墓志的平静记载下，是他们每个人独特的人生——天下闻名的良将贤臣，名门大族的普通人，终守闺阁的贵族小姐……这方石头是他们在世界上活过的证据。

# 巴黎和她的“美好年代”

■ 肖琦

整整一百年后，奥运会重返巴黎这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地。“我们很想你！”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在开幕式致辞中的这句话令人动容。巴黎为世界贡献了一场盛大的体育狂欢。移民、环保、性别身份……奥运会虽已落幕，但它引发的讨论仍在延续，如历史学家科林·琼斯在《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一书中所说，“巴黎保留了其蔑视各种解释和纷争的能力”“对巴黎城市意义的争论演变成一场对现代性本质的辩论，全世界的非巴黎人自由地参与进来”。回顾百年前巴黎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恩怨纠葛，我们也许对琼斯的这句话有更深理解。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认为，在青年教育中，体育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体育运动也有助于改善因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而低迷的法国青年的精神面貌。19世纪末古代奥运会遗址的发现激发了顾拜旦恢复奥运会的强烈兴趣，他认为这样的盛会不仅有利于在法国国内推广体育运动，也有助于增进世界青年间的交流与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在今天看来，顾拜旦的理念之所以能成功，固然归功于其自身的不懈努力，但很大部分也要归功于“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巴黎，19世纪的首都”，犹太裔德国作家瓦尔特·本雅明曾这么说过。19世纪的巴黎，虽然在城市规模上不及伦敦，却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与艺术之都。自普法战争结束的1871年开始至一战爆发前的四十多年更是被后人称为“美

好年代”。此时的欧洲整体上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艺术繁荣兴盛。当时一位外国人写道：“无论哪个地方，人们都不会像在巴黎那样幸福。移民、环保、性别身份……奥运会虽已落幕，但它引发的讨论仍在延续，如历史学家科林·琼斯在《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一书中所说，“巴黎保留了其蔑视各种解释和纷争的能力”“对巴黎城市意义的争论演变成一场对现代性本质的辩论，全世界的非巴黎人自由地参与进来”。回顾百年前巴黎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恩怨纠葛，我们也许对琼斯的这句话有更深理解。

“美好年代”里，马车逐渐为汽车所取代，电话与电报一起成为传播的媒介，电灯代替煤气灯，留声机与电影放映机开始普及。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兄弟第一次放映向观众收费的大银幕短片，这一天成为电影的诞生日。在交通设施方面，1900年7月19日，巴黎第一条地铁线正式开通。其中通向世博会一个入口的香榭丽舍—克雷蒙梭站，装饰着长长绿色金属藤曼和红色玻璃花朵，这是艺术家古马尔新艺术的代表作品。新艺术运动发端于法国，在1890年代中期成为欧洲主流的装饰设计风格。在绘画方面，当时的法国是西方的艺术中心，印象派运动引发了美术界的革命。这一时期还盛行卡巴雷餐馆和有现场音乐表演的咖啡馆。

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于“美好年代”的巴黎这座先锋之城。然而，顾拜旦有一句对巴黎与奥运会的评价同样为人所熟知，他说：“如果世界上有个地方对奥运会漠不关心的话，那首先就是巴黎了……”

1900年奥运会是作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被纳入其中同时举行

的。法国力图保持每十一年举办一次世博会的传统，1900年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法兰西共和国要通过世博会完美地与19世纪告别，以体现作为世界文明前哨的法兰西精神。而此前德国想举办世纪之交世博会的流言最终催生了法国的举办决定。1900年世博会是巴黎第五次举办世博会，前几次尤其是以埃菲尔铁塔为标志的1889年世博会的成功让法国大众和媒体对此抱有极大热情。

不过，在顾拜旦看来，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不具备任何奥运会的价值。因为纳入世博会举行，这届奥运会没有真正的开幕式，没有奖牌、没有体育场，甚至我们去翻看当时的报纸，都很难找出对奥运会的报道。许多运动员参加完比赛都不知道自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1900年世博会也反应消极，他们将滑冰鞋列入钢制品类，赛艇列入救生类，体育协会列入社会救济机构之列。世博会主席阿尔弗雷德·皮卡尔直言奥林匹克运动是过时的事物。

这届奥运会的处境完全映射出奥运复兴之路的艰难坎坷。“在1900年，体育精神还只是下意识地存在于真正的运动员身上。公众舆论对此几乎毫无概念，而行行政当局……更是一头雾水，如顾拜旦所述，在法国精英眼中，‘体育就像所有有益的娱乐活动，仅是正餐前的一个冷盘而已’。全世界范围内，俄国报界认为‘体育问题不值得在权威报纸上占一席之地’。奥林匹克主义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一个古怪而空泛的新词’。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对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的境遇表示同情甚至愤懑，但同时也要看到，巴黎才是这个词的策源地。如果没有1894年在索邦大学举行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就不会有国际奥委会的产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可能也无从复兴。正是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首次有女性选手参加了网球、高尔夫等比赛，使现代奥林匹克区别于古代专属于男性的奥林匹克运动。1924年巴黎第二次举办奥运会，建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第一座奥运村……2024年百年奥运回归巴黎，巴黎奉献了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在户外举办的开幕式。

这就是巴黎，这个既保守又先锋的巴黎，矛盾的巴黎，一直游走在现代性最前沿的巴黎。1865年，印象派的创始人马奈（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的作品《奥林匹亚》以其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在巴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评论界和新闻界的猛攻，被骂为“无耻到



1900年，女性运动员参赛的海报

▲ 马奈为左拉画的肖像画

极了点”。作家左拉勇敢地为其辩护，写道：“我们前一辈人嘲笑过库尔贝，到了今天，我们都在他的画前流连忘返；今天又在嘲笑马奈，将来又该在他的画前出神羡慕了。”

1889年世博会建造的埃菲尔铁塔曾经遭到巴黎大众与文艺界名流的反对。包括莫泊桑、小仲马、左拉及巴黎歌剧院设计者加尼耶在内的名流在《反对修建埃菲尔铁塔》的抗议书上签名，他们认为铁塔外形丑陋，是“巴黎的耻辱”。曾经热衷于描绘工业和现代城市生活的印象派画家们也开始对这一工业化的象征物表示厌倦甚至反感。埃菲尔对此回应道：“铁塔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高大的建筑物，为什么金字塔在埃及具有令人钦佩的价值，而铁塔在巴黎却变成了丑陋与荒唐的话柄”最终，这座“铁娘子”成为了巴黎乃至法国的象征。

19世纪六十年代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以其优雅、线性美、统一性成为现代城市的典范之作，但仅仅在二十年后

论衡

就出现了针对奥斯曼城市美学的批评。批评者称“那些新的林荫大道没有转弯，没有视觉上的冲动，一味地直线”。他们甚至在1897年成立了“老巴黎委员会”，而1900年世博会上，被参观次数最多的展厅之一就是陈列老巴黎所有美景的展区……巴黎，始终在新与旧、古与今之间撕扯，循环往复。正是在不断的否定与自我否定中，现代性抽丝剥茧，向着更符合人类期望的方向演进。巴黎对现代性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曾在《时间的谬误：现代性简史》一书中将诞生于法国的“现代性”概念内涵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30—1850）以艺术审美与政治领域的先行者为代表，他们是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第二个阶段是深刻改变了文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古典现代性（1850—1890）。第三个阶段他称之为批判的现代性（1890—1930），此时的现代性遇到更激烈的反现代性的浪潮，也受到了来自更为激进的现代主义的质疑。不难看出，很多时候这些现代性也是交织在一起的。百年奥运回归巴黎，我们感叹于塞纳河上那场不可思议、天马行空的奥运会开幕式，那些运动场外引发热议的话题，那些法国人致命的松弛感……可这就是巴黎，她习惯于做这样的先行者，无惧争议，更何况这些争议本身就是时代的题眼。巴黎没有辜负这场百年的重逢。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自己是抱怨不止的民族，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热情到不愿停止歌唱。”埃斯坦盖在闭幕式上说。愿巴黎奥运会以巴黎独特的方式为“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增添又一个现代性的注脚，成为又一个“美好年代”的序曲。（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